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

李 宏

摘 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既是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时代关切，又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追寻。中国是生态文明的“先行者”，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探索创新，展示了中国在生态价值与生态文明方面所创造的新境界。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政治哲学理念，也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用中国智慧凝聚了全人类绿色发展的基本共识，开创了符合时代潮流、更有光明前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X321；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1-0096-06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共建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美丽家园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负载时代价值和制度属性。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实践，既有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体系，也有利于为解决人类环境问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重新审视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功利化、狭隘化，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组成，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本身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人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要自觉地接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支配。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人能够发挥能动的主体作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就是不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升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19ADJ00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课题“岭南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研究”（2020GZGJ175）。

改变自然界的“自在自然”状态，使自然更多呈现为一种“人造自然”状态。要言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互相补充的“共同进化”的状态。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要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发展需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旦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不承认与自然界的内在有机关联，在本质上人自身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人类在同自然的良好互动中得以存在和发展。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实践活动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分化”状态，但这种“分化”不等于转变为“分裂”或“不容”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制度及价值观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对抗与分裂的状态。例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自然过度利用，把自然视为人们亟待征服、改造的对象，使得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依存关系，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异化。

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资本主义才得以确立和发展，但工业革命同样导致了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产生。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唯一的价值指向，当社会生产效益最大化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尖锐矛盾时，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必定不顾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这也注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落和消亡。不可否认，作为“经济人”的现代人已化身为技术工具理性主义，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和侵害了自然应有的道义，进而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相“异化”、人与人类社会相“异化”的窘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真正和解，是实现了“经济人”“社会人”向“生态人”“文明人”的转化。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自然本身和人类自身的双重改造。恩格斯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二者共同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人和自然组成的世界系统，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物质资

料的生产、人的生产及环境的生产等三种形式。所谓物资生产是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过程；人的生产指的是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物质资料消耗、自然环境的改变；环境的生产指的是在自然力和人类共同作用下，生态环境对其自然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在这个意义上讲，新的生产必然伴随着新的需求，新的需要必定反作用于新的生产。与此同时，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两种形式的供需关联：一类是人类向自然索取资源成为“需求”，自然向人类提供资源成为“供给”；另一类是自然向人类转化废物的能力成为“供给”，人类向自然排放废物表现为一种“需求”。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重大转变”，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决定人类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具体而言，一类是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无限物质诉求，与自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社会运行机制满足能力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正是两大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种文明无法避免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基本矛盾的激化时，就意味着它必然被一种新的文明所取代。如何破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相“异化”的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共同进化”，这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与自然对辩证统一的法则，既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思维范式的根本法则。

“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2]走生态发展之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大共识，这既是人类对社会发展历史所进行的反思，也是对建设未来美好家园的不懈追求。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急切地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尽可能地谋求快速“富裕起来”，人们过于偏重经

济发展而忽视或弱视生态环境的保证,未能深刻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辩证统一关系,误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相对立,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味征服的对象。

人类同自然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永不停止。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根源于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也应当是从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这是源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实践性,因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离不开历史的、具体的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文明和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表”和“里”的关系,人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发生了质变,文明也将呈现新的形态。人类的存在方式体现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及人的组织方式中,尤其是人的组织方式以制度形式呈现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制度形态集中地表现出了这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相“异化”的困境,亟待建立适应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制度体系。

现代化的内涵从最初的工业化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诸多领域,而生态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历史和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认识和探究,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变化。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人与自然关系和开创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过程,也是一个生态理论深化与具体实践创新的互动过程,更是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从“历史—理论—现实”三重维度上,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升华和实践进展,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上升到人类文明的范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二、深刻把握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这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创造优质生态产品、优美生活环境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开创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美好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从两个视角来观察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从整个世界生态现代化进程来观察中国道路,特别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现代化进程分析中国实践;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来审视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注重中国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区别。

生态现代化是环境意识所引发世界现代化进行的生态转向,也是人的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利耦合,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生态现代化是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生活向绿色生活、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根本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马丁·耶内克、约瑟夫·胡伯等人构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他们主张现代化进程不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立,而应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达到经济增长与生态治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当然,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一理论是在国家现代化完成后所产生,它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生态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生态现代化具有一定的有限性,不具有更为广泛层面的普遍适用性。

与之相反,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阶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家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交织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生态保护取向的、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进行的与西方生态现代化进程有本质差别。当然,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

上借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概念,但生态现代化理论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践和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适用,其是否具有全球适用性存在争议。如果我们简单照搬、套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可能使我们陷入理论误区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甚至会误导中国现代化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它不是对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简单借鉴和移植,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或西方现代化的反拨和超越,它有着思想深邃和行之有效的新内涵,是对新时代生态现代化的一种全新定位。那么,生态现代化是否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所谓生态现代化,依然是依托或者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一种特质,受各种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左右。例如,一些发达地区走向生态现代化之路,往往又是以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破坏为条件或代价的。资本驱动下的财富累积只单纯为了累积本身,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大自然第一次成为人类的客体,成了纯粹的实用问题,不再被视为自身的一种力量。而对大自然的一些自主定律的理论性发现,只不过是把大自然从属于人类需要的一种花招,不论是作为一种消费对象,或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4]“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它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成果。“文明”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社会的文明进步往往表现在物质资料生产、精神文化生活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社会主义的生态正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正义,资本主义的生态正义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旨在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生态帝国主义”难以掩盖其反生态的本质。与之相反,社会主义生态正义是一种“实质

上”的正义,它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向往。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之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的科学论断,改变了对生产力的狭隘理解。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属于“后来者”,但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在成就上属于“引领者”。中国生态现代化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生态现代化模式,它更注重党和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并将生态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方面。

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因其内在矛盾难以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6]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和可供升华的理论基础。现代性建设是人类幸福和人类解放的钥匙,也必然成为当代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艰巨任务。生态现代化建设既是重大的理论主题,也是迫切的现实实践。为此,我们既要进行理论创造,又要为中国实践提供可能。相较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处在由“跟跑”走向“并跑”,最后实现“领跑”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确定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只有明确“身在何处”,才能明确“走向何方”。这在实质上讲的是中国道路的总依据、立足点问题,历史方位既然是历史坐标,就是确定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发展目标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把绿色生产和美好生活有机统一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既是解决物质资料的问题,也是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更是进一步解决人的发展的问题。这种全面现代化的道路突显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本质的一致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课题。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更源于“制度危机”,它既涉及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又涉及具体规则

的总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首个把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执政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发展定式。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成为全人类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可行方案。

中国要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关注本国、本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还要关注他国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处理好本国民族利益与全球整体价值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新道路是独立自主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的创新性、文明性的贡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种“现代化”不是复制西方的“肯定版”，而是立足中国的发展实际，融入东方智慧的“中国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7]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主动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中国并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狂潮中湮灭、崩溃，就在于我们始终把握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指引中国实践，走出了一条既符合当今时代潮流，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三、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将走向何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8]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地球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这昭示了共建美丽地球家园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尽管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生产力水平不同，但推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发展之路。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英国学者戴维·佩珀指出：“既然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

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驱动下，使得自然界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人与自然关系呈现一种“异化”状态。

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世界怎么了”必然就引向“我们怎么办”的现实之问，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亟需找寻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全人类命运是相一致的。凝聚最大发展共识，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尽管世界各国国情有所不同、文化各异、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但全人类对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认识、新理解，极大拓展了人类对生产力内涵的认识，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中国倡导构建一个“尊崇自然、清洁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这一主张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高度一致性，超越了资本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东方智慧。

事实证明，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0]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1]系统阐释了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建设繁荣美丽新世界应该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建美丽地球家园。面对挑战，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肩并肩，共同应对难题；谋求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牵手，共同缔造繁荣；应对变局，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心连心，共建美好未来。

没有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现代化。制度文明是人类理性实践的产物，这是一种合理的、进步的，并为人民群众拥护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制度

文明的新发展、新形态,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了新智慧,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选择,进一步彰显了我们致力于建设共同美好未来的新使命。事实上,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根源于“制度危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2]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标准,而且要将这些标准具体量化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世界美了,中国才能美;中国美了,世界将会更美。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们不会骄傲自满,更不会一家独享。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決心不会改变,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決心不会改变,与世界携手同行的決心更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始终是全人类利益的维护者、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中国向全世界郑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一个开放发展、繁荣富强、清洁美丽的中国,必将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到那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得到真正而彻底的解决,是一个实现了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把“美丽”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内涵,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了一条绿色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更是中国为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贡献。开启全面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和美丽家园的伟大事业,中国将始终站在对全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

积极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积极持续推进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共建一个繁荣、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
- [2]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01(01).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 [4] [美]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M].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3.
- [6]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39.
-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 [9] [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40.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8.
- [11]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21-04-23(02).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1.

作者:李宏,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钟晓媚